

曾曉梅編著

碑刻文獻論著叙錄（上）

◎中國石刻文獻研究叢刊◎

綫裝書局

中國石刻文獻研究叢刊

碑刻文獻論著叙錄 (上)

曾曉梅 編著

綫裝書局

序

曾曉梅君的《碑刻文獻論著叙錄》(以下簡稱《叙錄》)就要付梓了,她來信想請我寫一篇序言。我本來是不大習慣做這項工作的。這倒不是因為怕耽誤時間,而是因為學識不夠,不能深透理解全書內容,擔心說不到點子上,有負其書,有負作者,更有誤讀者。不過看完書稿,覺得該書很有價值,作者為學界做了一項很有意義的工作,確實值得肯定,值得稱道,更值得介紹、推廣,於是欣然寫下這段文字,以就教於廣大讀者。

一、《叙錄》是碑刻文獻學科建設的力作

《叙錄》的性質屬於目錄學、學術史。目錄作為問學之階梯,治學之津梁,其意義與作用早已被前代學者一再論述,並加以強調。目錄的工作做好了,可以展示學科史的發展歷程,可以窺見一個學科在不同歷史時期的基本面貌、特點和優劣得失,更可以啓導這個學科繼續向更深的領域、更廣的空間拓展。目錄之於學術,其意義實在是很大。

目錄之學是建立在論著基礎上的,而論著又必須以文獻材料為依托。碑刻文獻是我國無比浩瀚的各類文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華民族歷史文

化的寶庫。打開這座寶庫，其數量之多，內容之富，品類之衆，質量之好，令世人驚嘆不已。如果說與甲骨文同時的碑刻銘文還僅僅是石刻的萌芽，那麼戰國石鼓銘文無論是製作工藝、書法藝術，還是奇妙構思、豐富內容，都已經達到相當高的水平。著名的秦刻石，其數量、規模和氣勢也非常壯觀。奇怪的是西漢刻石根據發現、著錄或保存的情況看，不僅數量很有限，而且規模也很小。其刻字少者僅數字，多者也不過數十百字而已，至今尚未發現鴻篇巨製。到了東漢，國家穩定，經濟繁榮，為碑刻的勃興準備了物質條件；經過西漢“廢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提倡孝道，助長了厚葬之風，為碑刻的發展提供了文化基礎。碑碣、石闕、摩崖、墓記、畫像題字、石經等衆體基本具備；碑刻形制趨於固定，追求美觀，製作攷究，開始出現形體高大、鐫刻精美的豐碑；塚墓神道，宮宇廟祠，道橋閭里，觸處有碑，遍及天下。魏晉南北朝社會大動蕩，民族大融合，思想文化多元發展，促使碑刻文獻在承繼東漢石刻繁榮餘風的同時，新的碑刻樣式造像記、幽埋誌墓銘刻得到空前發展。唐代是中國整個封建時代的鼎盛時期，國力的強盛，各個領域都反映出張揚恢宏的盛唐氣象。在蓬勃向上的時代精神鼓動下，產生出大量的豐碑巨製，碑刻文獻各體俱全，數量衆多，內容豐富，製作精美，超過了所有時代。宋代以後，碑刻開始走下坡路，不再有唐碑那樣雄渾的氣勢，凝重的風格，豐滿的內容，靈動的形式。不過，宋代以後的碑刻文獻也有自己的特色。少數民族古文字碑成批產生，法書碑大量出現，一定數量的圖碑留下了一批科技史資料，反映下層社會經濟形態、生產力水平、工商業狀況、民間生活習慣、風俗民情等內容，形成這個時期碑刻文獻的一大特色。

豐富的碑刻文獻的客觀存在，必然會引發學者對這種文獻的關注和研究。最早關注碑刻文獻的是司馬遷，他在《史記·秦始皇本紀》中錄下秦始皇所刻6石中的5石銘文，僅缺《嶧山刻石》。賴此書我們才得以知道秦刻石的大致內容。北魏酈道元《水經注》，隨水系介紹了他所見到的各地所立漢代石刻一百餘通。敘述立碑地、碑刻形制、留存情況，並摘錄部分字句。這些碑刻後

世大多已亡佚，僅能憑《水經注》略知一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在《集古錄提要》中提及“自梁元帝始集錄碑刻之文，為《碑英》一百二十卷”，這是我國有典籍記載的第一部碑刻文獻資料，可惜並沒有傳下來。唐代發現石鼓，曾在社會上引起轟動，不過當時學人並沒有認識到它的文獻價值，只是被視為神聖的古物而受到頌揚。

從學科史的角度攷察，真正意義上的碑刻文獻整理與研究是伴隨着器物學、古文字學而產生的，傳統稱之為金石學。這個學科肇始於北宋，歐陽修的《集古錄》首開其端，隨之趙明誠《金石錄》和洪适《隸釋》、《隸續》揚其波。之後，搜集、整理、研究碑刻的隊伍逐漸壯大，研究領域逐漸開拓，研究的成果不斷豐富。到清代發展到鼎盛，金石學人數以千計，研究成果非常可觀。只是封建時代的碑刻文獻研究很長一段時間都處於傳統金石學的水平，側重於碑石搜訪、拓片收藏、碑目編製、碑銘錄讀、書法藝術鑒賞、文字書體攷釋、文史攷證、碑刻拓本校勘、碑刻形制介紹、碑刻文例總結等方面。而且很長時間都是金石並重，彼此不分。直到清末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出，金石才開始分家。儘管如此，碑刻文獻的研究成果還是非常豐富。民國以後，尤其是新中國成立以後，學科分支日趨明顯，碑刻文獻整理與研究逐漸走上系統化、科學化的軌道。研究目標更加明確，研究內容更加確定，研究思路、方法和手段更加科學，隨之碑刻學、碑刻文獻學的建立也就提到日程上來。

出於學科建設的需要，碑刻文獻研究的歷程應該清理，歷代研究的成果值得檢討，歷代金石學研究流派應該爬梳，研究的成功經驗和存在的缺陷必須總結。《叙錄》所做的工作正是對碑刻學、碑刻文獻學學科建設所做的實際貢獻，其意義無疑是很重大的。

二、《叙錄》是對碑刻文獻研究成果的系統清理

對碑刻研究成果的清理，前人曾經做過這項工作。由於歷史的局限，並且也受到學科發展水平的制約，平心而論，這項工作並沒有做好。清李遇孫

曾撰著《金石學錄》，介紹金石研究者500多人；褚德彝《金石學錄續補》收錄清至民國初研究、收藏金石的學者及其著作計232人。民國時期宣哲著《金石學人錄》記載歷代金石學人1469人；又著《金石學著述攷》，收錄金石學著述2200餘種，二書都只是稿本。容媛著《金石書錄目》，收錄經過目驗的歷代金石專著977種。許敬武著《清代金石學家列傳稿》，介紹清代有成就、有影響的金石研究者48人。林鈞撰《石廬金石書志》，著錄1921年6月以前歷代金石著作969種。

以上各書如果僅僅從數量上看，對金石研究成果的著錄應該已經相當豐富，但是細緻查檢便會發現，介紹石刻方面的成果實際並不多。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各書金石不分，所錄金石學人及其著作專治金文者遠比專治石刻者多。不少論著雖題名金石，其實名不副實，只有金而沒有石。兼治金石者，也重金輕石。以容媛《金石書錄目》為例，其增訂本收金石著作977種，金石兼涉的其實不足300種，專收石刻的著作就更少。第二，選目無標準。收藏和研究不分，介紹的很多金石人物只是收藏家，而非研究者。如陸心源《金石學錄補》所收330餘人，大多只是自漢至清收藏三代金器的玩家，並沒有著作，更說不上研究。第三，各書所收金石人物、金石專著彼此重複。有的只是憑典籍記載，並不見事跡，更無著作，資料可靠性差。如宣哲《金石學著述攷》所收金石學著述，其中就有大量遺佚不傳之作。第四，凡攷一金一石，見目就收，不加裁擇。如林鈞《石廬金石書志》專攷一器一碑者亦予收錄，其實很多是很難成家的。

《叙錄》著錄標準堅持以實存典籍為據，且著作以專治石刻，或金石兼治而以治石為主者。這樣便突出了石刻文獻研究成果的主題。所收著作1900餘種，上自北魏，下迄2009年。有版刻，有石印，有排印，有影印，有油印，有鈔本。多數為正式刊刻、印刷出版，個別為內部印刷物。多數為單行本或抽印本，也有少數叢書，還有個別收錄碑刻研究論文的文集。

作者既主要收集大陸歷代碑刻文獻論著，也注意收錄臺灣的論著，如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臺灣教育碑記》，不分卷，收在《臺灣文獻叢刊》第54種；劉枝萬著《臺灣中部古碑文集成》，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不分卷，收在《臺灣文獻專刊》卷五第三、四期第151種；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臺灣南部碑文集成》，二冊，收在《臺灣文獻叢刊》第218種；邱秀堂編著《臺灣北部碑文集成》，臺北市文獻委員會印；何培夫主編《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志》，一六冊，臺北“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印；吳新榮纂《臺南古碑志》，不分卷，《石刻史料新編》第三輯(20)地方類臺灣省影印本等。

更可貴的是收錄韓國、越南、泰國、馬來西亞等國的漢文碑刻論著。如陳鐵凡、〔德〕傅吾康(Franke, Wolfgang)編《馬來西亞華文銘刻萃編》，三冊，馬來亞大學出版社1982年、1985年、1987年連續出版；莊欽永編著《馬六甲、新加坡華文碑文輯錄》，收入《民族學研究所資料彙編》，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1998年出版；傅吾康主編《泰國華文銘刻匯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8年出版。這些著作對於攷察漢文化在世界各地的傳播，研究海外華人的創業歷史、社會活動、生活狀況、風俗習慣、與各國人民的友好交往等是最難得的資料。

既主要收中國學者的著作，也收錄外國學者的論著。如除上文提到傅吾康的論著外，還收錄〔葡〕陽瑪諾著《唐景教碑頌正詮》，清光緒四年(1878)刊本，這是外國人研究中國碑刻的第一部專著。〔法〕沙畹(Edouard Chavannes)著《中國兩漢石刻》，Paris, Ernest Leroux, 1893年。這是第一次把漢畫像介紹到西方的論著。還有〔美〕尼古拉斯·鮑培(Nicholas Poppe)著，郝蘇民翻譯、補注《鮑培八思巴字蒙古語碑銘》，漢文譯注補正本，內蒙古文化出版社，1986年10月。鄭振滿、〔美〕丁荷生編纂《福建宗教碑銘彙編·泉州府分冊》，三冊，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

主要收漢文碑刻研究論著，而對民族文字碑刻著錄和研究的論著也儘量收集。如對突厥文、西夏文、契丹文、八思巴文、女真文、藏文等碑刻文獻的著錄與研究的著作，書中都儘量立目介紹、評價。

所有這些都反映出《叙錄》作者開闊的學術視野和敏銳的學術眼光。

所收論著可大分為碑刻文獻著錄和碑刻文獻研究兩部分。著錄類著作包括碑刻著錄的形式、著錄內容、著錄條例的討論,也包括著錄具體碑刻文獻,如碑目、跋尾、圖錄、錄文等。研究類著作有碑刻文獻本身的研究,如碑款研究,包括碑刻形制體式、紋飾、石質、大小尺寸、出土、流傳、收藏、殘損情況的調查與研究;碑刻製作研究,包括選石、撰文、書丹、鐫刻研究;碑刻辨偽研究,包括挖洗補綴、翻刻、偽刻、辨偽方法的研究;碑拓研究,包括拓碑源流、捶拓技術、拓本類別、碑拓版本、裝幀;碑刻保護研究,包括碑刻保護的歷史與現狀、碑刻毀損原因探討、碑刻保護的方式、碑刻保護策略、全國重點碑刻保護單位的介紹與研究;碑刻銘文整理研究,包括整理方式、整理中存在的問題、碑文釋讀法、釋文校勘和文字攷辨;碑刻分類研究,包括分類原則、分類方法的討論;碑刻文例研究,包括碑文辭例、格式、避諱、稱謂的研究;碑刻攷古研究,包括田野調查、攷古發掘、碑刻時地記錄等,內容非常豐富。也包括利用碑刻文獻從事哲學、歷史、政治、經濟、宗教、民族、民俗、書法、語言文字、文學、科技等方面的研究。所涉領域甚廣,眼界亦高。

三、《叙錄》著錄的內容充實

治目錄有深淺之差,有精粗之別,其於學術之功用自然也就有大小之分。目錄包括目與錄。目者,目其書名,也有的連同篇名一起列出;錄者,序錄之謂,概述著作之大意,說明一書之得失。好的目錄應該是有目有錄的,可以藉助目錄辨章學術,攷鏡源流,以之作為科學研究的輔助工具,為治學者提供更多有用的信息。如果僅僅有目無錄,當然也有用處,不過只是給治學的人開列一個書單,便於按目索書而已,其功用當然也就小得多。清點已有的各種金石學目錄書,發現都只是有目無錄,自然不能滿足研究之需。《叙錄》則不同,目其書,更錄其旨,還有對典籍的評點。姑錄一條以代替我的敘述。

《河東鹽池碑匯》, 吳鈞編注, 南風化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編，《運城地區三晉文化研究叢書》，山西古籍出版社，2000年11月。本書收錄山西河東地區即今山西省運城地區有關鹽池的碑刻70餘通，上自北周，下至近代，皆為現存碑石和有藏拓之碑刻；已亡佚者，僅存其目，附於書末。碑目下注明立碑時間、所在地點、高廣尺寸、行字數、書體、字徑等。過錄原文，加注標點，漫漶難釋讀處用“□”代替。文中別字、異體字無對應之簡體字，按原字照錄。末酌加按語，輯錄前人跋語，並編者述評。同時，簡介撰書人，注釋碑文中疑難字詞。碑刻內容豐富，涉及河東鹽池的幅員、鹽法、渠堰、運銷、引目、課額、恤政、修建神廟等方面。如唐《河東鹽池靈慶公神祠頌并序》記載唐玄宗之前朝廷重農抑商、規定銷鹽之範圍；宋明道二年（1033）《皇宋放商鹽頌并序》記錄朝廷謀劃如何經營鹽業；元《敕封永澤資寶王》、《敕封廣濟惠康王》等，反映元代河東鹽池管理權之爭；元延祐元年（1314）《鹽神廟碑》，記述解鹽生產方法，表明在大德到延祐期間已將唐、宋以來的畦曬法改為原始落後的自成法，且不加以烹煉煎煮。這些碑刻，集中反映了作為北方地區主要食鹽產地的河東，在經濟上享有重要地位，其生產、調運、銷售不僅是河東經濟發展的特殊標誌，而且成為山西地區與中央政權及其他地區的聯繫紐帶。同時，這些資料還為進一步研究歷代中央政權的經濟政策、課稅制度提供了實證材料，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作者詳述內容，揭示特點，肯定成就，指出研究價值。讀其書，能激發很多研究思路，發現很多研究題目。

論著版本也是《叙錄》十分關注的問題，特別注意介紹初版本、影印本、修訂本、校注本和最新版本。既照顧到學科史，又充分考慮版本的準確、精要、適用性。如叙錄北宋趙明誠撰《金石錄》，僅介紹版本就有：龍舒郡齋宋刻本，收入《古逸叢書散編》，中華書局據龍舒郡齋本影印，1991年；謝世箕刻

本,清順治七年(1650)刊;《四庫全書》據兩淮馬裕家藏本採入;《雅雨堂叢書》本,乾隆間(1736—1795)刊;《三長物齋叢書》本,道光年間(1821—1850)刊;《行素草堂叢書》本,光緒十四年(1888)刊;又金文明著《金石錄校正》,上海書畫出版社,1985年1月出版,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再版。明趙誦撰《石墨鐫華》著錄“明萬曆四十六年(1618)趙氏自刻本,《四庫全書》據安徽巡撫採進本收錄;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鮑氏《知不足齋叢書》本,《叢書集成初編》據之排印,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五年(1936);《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25)目錄題跋類據知不足齋本影印;《學古齋金石叢書》本,光緒八年至三十年(1882—1904)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難能可貴的是《叙錄》在充分肯定碑刻文獻研究的歷代成果的同時,又能恰當指出各書存在的錯誤、缺陷,而且大多中肯,能點中要害,提醒使用者注意,即使當代作者的研究論著也不迴避。如新文豐出版公司編輯部編輯《石刻史料新編》100冊,是一部有關金石學的大叢書。《叙錄》在肯定其金石學研究價值後,指出該書編輯時,未注明所據版本,只能依書中之影印情況來判斷,給學術研究帶來一些不便。所題書名、作者人名、朝代、論著卷次間有錯誤,如第一輯(14)所收清陸心源輯《吳興金石記》十六卷,“記”誤為“錄”;第三輯(9)所收清黃瑞輯,王棻校正《臺州金石錄》十三卷,附《甄錄》五卷,《闕訪》四卷,目錄卷次“十三”,誤為“十二”。也有重複收錄者,如福建通紀局編纂《福建金石志》三十卷,第二輯(15)與第三輯(16)的地方類均收錄,區別是前者有目錄,後者無,但內容完全一樣;清武億纂《安陽縣金石錄》十二卷,第一輯(18)收清嘉慶刻本、第三輯(28)收民國二十二年(1933)北平文嵐移古宋印書局鉛印本,實同一書。評徐自強、吳夢麟著《古代石刻通論》於“石刻分類仍有缺陷,把‘刻石’單立一類,實無必要;劃分標準不一,或以碑刻形制,或以銘文形式,或以碑刻內容,彼此交叉。述多論少,主要是著錄碑目,與書名不合”。指出很多著作在碑文釋讀方面的錯誤,如吳鼎昌《誌石文錄續編》錄《程度墓誌》“捨身恭造,乘願正道”,“願”,誤作“顛”;“二月廿八

日甲寅營訖事”，“事”，誤作“畢”。《韓顯宗墓誌》“加以繒帛之賻”，“繒”，誤作“縹”；“昔聞晉叔，今覲齊孤”，“晉”，誤作“曹”。徐玉立主編《漢碑全集》錄文錯誤，如《成都王伯魚闕題記》“槌為江陽長王君卒”，“卒”，誤作“平”。《張仲有修通利水大道刻石》“泥淖”，誤作“□渠”；“永不上渠道”，“不上”二字，誤釋作一“水”字。《成都永壽元年畫像石闕銘》“忉懔悔歷□消形”，“形”，誤作“荆”；“心懷弗寧”，“弗”，誤作“不”。

作者條其篇目，撮其指要，論其是非，評其得失，覽錄而知旨，觀目而悉洞。要做到這一點，實在不容易。這不僅必須閱讀大量的材料，而且需要有較高的學術眼光和深厚的知識積累。看得出作者是經過仔細閱讀、認真研究後提出的個人意見。反映出作者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勤奮樸實的治學態度，廣博深厚的文獻學功底。

四、《叙錄》的編排體例科學合理

《叙錄》在編排體例上經過細心構思，寫出詳細凡例，並嚴格執行。著錄的碑刻文獻論著一律按年代編排，既與學科發展史取同一步調，又便於查找。相關的論著，注明互詳、互見，使各書彼此照應，渾然一體，顯示出全書的系統性。

為了方便讀者使用，有時又靈活處理。有的論著是對前人著作所作的訂補，或某幾本書性質相同，具有緊密的內在聯繫，於是就放在一起。這種辦法帶有主題分類的性質，是對按年代編排的體例容易割裂論著之間聯繫這一缺陷的有益補充。《叙錄》具體處理方式視論著性質而定。或采用主條附錄的辦法，對主條論著詳細介紹，其他各條論著則簡要附後。如清程夢星撰《江都碑目志》，收在《江都縣志》卷三〇《碑目》，清雍正七年（1729）刊。之後清李保泰為之續補，撰《江都碑目續志》，收在《江都縣續志》卷八《碑目》，清嘉慶二十四年（1819）刊，光緒六年（1880）重刊本。清劉壽增纂《江都藝文續攷》，收在清光緒《江都縣續志》卷二〇《藝文攷》第一〇，光緒九年（1883）刊。

桂邦傑纂《江都縣金石續攷》，收在《江都縣續志》卷十五《金石攷》，民國十五年(1926)刊。四書著錄江都縣傳世和新出金石，各有所重，互為補充，攷證多詳，尤重碑銘書法，評價多恰當，充分展現清雍正至民國期間江都重視收金石、修方志的傳統。四書刊刻時間上下數百年，但都是一地碑刻，故《叙錄》將其放在一處來介紹，為研究該地歷史變遷、政治經濟、文化教育、人物傳記等集中提供了實證材料。又如在《叙錄》介紹漢、魏石經殘石集字、研究時，將馬衡編著的《集拓新出漢魏石經殘字目》、《集拓新出漢魏石經殘字目二編》放在一起，並且以《集拓新出漢魏石經殘字目二編》為主條，對此書集拓漢魏石經殘字詳細介紹。接着介紹吳寶煒編《集拓新出漢魏石經殘字三編》，然後將陳宗彝、萬中立、王國維、陳乃乾、王照、吳維孝、白堅、王小航、張國淦、章炳麟、屈萬里、錢玄同、孫海波等13家的集字和研究著作都附在後面，作為一條來處理。這樣安排不僅節省了篇幅，而且更重要的是將分散的資料，以專題的形式集中在一起，為後來的研究者對已有研究成果有一個整體了解，並且可以直接獲取這些資料的相關信息。

或者將相關各書，彼此獨立，分條按時間先後，緊接編排。如《金石萃編》成書之後，有很多續補、勘正之作，計有《平津館金石萃編》、《金石續編》、《金石萃編補略》、《金石萃編校字記》、《金石萃編補正》、《金石萃編補目》、《讀金石萃編條記》、《金石萃編補遺》、《金石萃編未刻稿》、《希古樓金石萃編》、《八瓊室金石補正》、《八瓊室金石補正續編》、《金石萃編校補》等，本書將它們編列在一起，既集中了石刻資料，又反映出《金石萃編》在碑刻學上的歷史地位及其重大影響。

通觀《叙錄》全書，這種專題式彙集介紹，或以碑刻內容，或以地域碑刻，或以研究者，或以叢書，或以碑刻著錄形式，集中分題介紹，便於顯示具體專題的碑刻材料、碑刻研究成果及現狀、碑刻研究特色等，為該專題的繼續研究提供信息、資料，啟發研究思路。如著錄羅振玉的石刻著作，以《羅雪堂先生全集》為基點，介紹羅氏所及碑刻收集、整理與研究的著作，條分為

以下幾類：關於《寰宇訪碑錄》續、補、勘誤的著作，冢墓銘刻錄文，地方碑刻錄文，碑刻專題研究，碑刻斷代研究，跋尾式的研究著作，碑別字研究，碑刻目錄，利用碑刻補正史傳，碑刻版本鑒別，碑刻拓本圖版。不僅為碑刻文獻研究、利用碑刻從事文史研究集中提供了資料，而且對於展示學科研究著作、學科研究的歷史特徵、學科研究焦點等學科史的重要問題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以上是我閱讀《叙錄》的一些體會，願意提前寫在這裏向方家請教，與廣大讀者交流。或許掛漏者有之，偏誤者有之，不過都不會影響這部著作對於推動碑刻學、碑刻文獻學研究向前發展所應起到的促進作用。

毛遠明

2010年8月28日於西南大學

凡 例

1. 本書以提要介紹歷代石刻著錄、研究論著為主，金石兼論者，酌收。單篇論文不收，論文集酌收。所收論著上自北魏，下迄公元2009年。

2. 提要內容主要包括書名、作者、卷次(冊數，凡有卷數者不再列冊數)、書籍形式、出版者、出版年月、主要內容、編纂特點、對該書的評價等。

3. 關於論著紀年，凡清代之前，以帝王年號紀年，並在括號中注明公元紀年；1949年前，民國紀年者，括號中注明公元紀年；1949年後用公元紀年。同一條論著提要中，凡涉及同一年號者，一般在第一次出現時詳注朝代和公元紀年，後面再次出現，則不再重書朝代和公元紀年。

4. 按論著成書或所據雕版、出版年月編排。同年月者，按書名首字字母排列。首字字母相同者，以首字筆畫多少排列。書名相同者，按作者首字字母音序排列。其中，清代之前以帝王年號紀年為次，只有年號無具體年月者，置於該年號末，再依書名首字音序排列。無確定年月者，按作者活動時期或卒年置於相關時代；若同一作者有其他論著且有出版年月者，可據之確定大致年月。凡論著有起止年者，按止年排列；起止年不全者，一般以止年排序，沒

有止年者按起年排序。

5. 有的論著是對某書所作的補充訂正,或與某書性質相同,根據情況安排條目,或置於前書之後,或與該書合併,以便互相參證,總體把握。如清孫星衍、邢澍編《寰宇訪碑錄》十二卷,清嘉慶七年(1802)刻本。又有清趙之謙《補寰宇訪碑錄》五卷,附《失編》一卷,同治三年(1864)刻本;羅振玉《再續寰宇訪碑錄》二卷,精舍石印本,光緒十九年(1893);李宗瀨撰,文素松校補《寰宇訪碑錄校勘記》二卷,廣州余富文齋刻本,民國十五年(1926);劉聲木《寰宇訪碑錄校勘記》十一卷,《補寰宇訪碑錄校勘記》二卷,《再續寰宇訪碑錄校勘記》一卷,《續補寰宇訪碑錄》二五卷,直介堂叢刻本,民國十九年(1930)。各書都是對孫氏《寰宇訪碑錄》的補充,便置於此書後,並按出版年代排列,以便利查找。凡合併者,在書末附錄的《論著目錄索引》中體現,以備查檢。方志中同地金石而著錄非一家者,亦遵此例。

6. 地方史志列有金石志之目,收錄該地碑刻者,予以收錄。叢書中有專收金石者,亦予收錄。以金石為主題的叢書,作為一個條目提要介紹。叢書下所涉各種金石論著,一般僅列書目備查,不再一一介紹。若已逐一分條介紹者,為避重複,一般不再列書目。

7. 凡法帖刻石、書學論著以書法為主旨,涉及碑書者,擇其重要者予以收錄。無文字銘刻之畫像石、石窟造像等論著,於鐫刻藝術和藝術史、哲學思想、宗教學、民俗學、文化史等方面的研究價值大,於文獻價值不大,本書一般不收錄。但論著中有文字題刻之拓片或過錄銘文,或雖無文字,而於學術有獨特貢獻者,酌情收錄。

8. 文中所涉《中國方志叢書》影印本,由臺北成文出版社1966年至1985年出版;《石刻史料新編》(共四輯),由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於1979年至2006年影印出版;《文淵閣四庫全書》,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影印出版;《續修四庫全書》,《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至2002年出版。文中只記書名,不再單列出版社、出版時間等,以節省篇幅。

9. 書後附論著目錄筆畫索引、論著作者音序索引、未經眼論著存目筆畫索引、主要參攷書目。論著名、作者名後數字係本書中的序號。書目索引按筆畫多少編次。凡書之續、補等均列完整書名。如清翟雲升編撰《隸篇》，一五卷，續一五卷，再續一五卷，列《隸篇》、《隸篇續》、《隸篇再續》三條書目備查。凡所收書之不同版本，即使書名、序號相同，亦单独列一條。未經眼之論著存目，以提供綫索。參攷書目按出版時間先後排列。

目次

序	毛遠明
凡例	1
北魏	1
1.《水經注》 2.《水經注碑錄》 3.《洛陽伽藍記》	
唐代	4
4.《書譜》 5.《干祿字書》 6.《五經文字》 7.《唐石經》 8.《法書要錄》	
宋代	8
9.《淳化閣帖》 10.《法帖釋文》 11.《法帖刊誤》 12.《法帖釋文攷異》 13.《欽定校正淳化閣帖釋文》 14.《淳化秘閣法帖攷證》 15.《淳化閣帖釋文》 16.《大觀帖》 17.《絳帖》 18.《汝帖》 19.《集古錄跋尾》 20.《集古錄目》 21.《集古錄補目補》 22.《元豐題跋》 23.《墨池編》 24.《東觀餘論》 25.《金石略》 26.《金石錄》 27.《廣川書跋》 28.《籀史》 29.《隸釋》、《隸續》 30.《隸韻》 31.《嘯堂集古錄》 32.《漢隸字源》 33.《負暄野	